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

ZHHONGGUO
XIANDAI JUNSHI
WENXUE CONGSHU

南天一柱

曹白口著



大寨文 文艺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一辑:国内革命战争)

南天一柱

黎 白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天一柱/黎白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9-4

I. 南…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233 号

南天一柱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0 字数 208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9-4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前 记

黎 白

(一)

这部长篇小说描述的是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领导下于1934年10月在四川、贵州两省边界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辉煌斗争历史在几十年来文学作品中极少涉及，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必去讲了。实际上，这段历史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书写的。它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意义。它表现在：

第一，两个军团会师时，总兵力不足八千，弹少药缺，人疲粮尽，是两支各自经历极其困难之后会合的疲惫之师。然而，在会师之后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展开了六次规模颇大的战斗，消灭了敌军三个师共二十几个团，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长江以南之后，惟一在江南与敌进行战斗并取得伟大胜利、开辟广阔苏区的一支主力红军。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上是独特的，具有很大意义的。因此，写出这段历史，对于加强对我党、我军历史的宣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之际，正是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并在长征途中的湘中战役中遭到极其严重损失之时。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时总兵力为八万六千余人，湘中战役减员过半，也是疲惫之师。红二、六军团为全力支援一方面军，以一万余人的全部兵力，坚决、果敢地进军湖南心脏地区，歼灭敌军，威慑省府，使敌惊恐万分，急调围堵追击红一方面军的主

力部队 80 余个团回撤。红二、六军团不计得失地支援红一方面军，全力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是在我军历史上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作出的顾全大局的重大贡献。在我军历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在我党的历史上，同样是体现共产主义高尚品德的光辉的一页。

第三，湘鄂川黔地区的斗争，应是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领导同志团结一致，创造辉煌成绩的一年，也应是他们个人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因此，写出这几位我党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物，写出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用以启示当代青年是很必要，很有意义的。

第四，由于以上原因，本书的书名拟为《南天一柱》，以示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后，在长江以南，作为主力红军只有红二、六军团仍进行着开辟根据地并与敌人进行着胜利的斗争，有力支持着江南各个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实为江南革命武装斗争的擎天柱。

(二)

写出这部长篇小说《南天一柱》是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或者说在我的几十年文学创作中，这部小说长期以来并没有列入创作计划之内。

说它必然，又是有很长久历史渊源的。1947 年，我在晋察冀军区炮兵旅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陈靖同志就是红军六军团的老同志。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他无数次讲述过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历史和战斗经历。红军的无畏精神、革命品质、艰苦卓绝的斗争，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建国后，我们合作创作了描写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于 1957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3 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金沙江畔》。

1959 年至 1962 年，我奉命参加《红二方面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三年编史，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访问了许多老红军和当年苏区的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和基层干部，使我对红二方面军的历史有了较深、较多的了解。由于我分工的内容是以红二军团，特别是以贺龙创建的红四军及湘鄂边苏区为主的，因此，对红六军团及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及开辟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历史所知很少。

1987年至1990年,我参加了《红二方面军战史》的修改工作;1990年至1993年参加了由总参谋部组织的《贺龙传》的编写和修改工作,才对红二、六军团从会师到长征结束,直至抗战时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但并不是十分全面的。

几十年来,由于参加了《红二方面军战史》及《贺龙传》的编写工作,也就先后出版过几部反映这些历史的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作品,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多的十分重要的斗争历史,却从未涉及过,也从未想到要以文学形式来反映。

这段历史未被反映,未能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确是一个遗憾。至少,对于我——一个在军队从事五十年以上文艺创作的专业工作者而又有机会较多了解这些历史的人而言,是未能尽责,甚至从未有此创作想法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尽管我认为即使我尽了责,创作出反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作品,也未必能写得很好,未必能生动地反映出那一时期如火如荼的斗争。但,那是说明我的水平有限,力所不及,却是尽了我应尽的责任。而我却从未有过应尽责任的念头,这是应当自责的。

(三)

1989年11月13日,《红二方面军战史》修改完成,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及主持战史修改的原红二方面军几位健在的老同志杨秀山、廖汉生、王恩茂、黄新廷、谭善和、谭友林等和我们几位执笔修史的成员,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会前,肖克、王震同志向我说,应该将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写成文学作品。希望我能承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应该以文艺形式反映这一段历史的提法。而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写好的把握,所以,当时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因为那时我已接受了参加编写和修改《贺龙传》的任务,时间至少要两三年;即使接受肖克、王震同志提出的建议,也只能待《贺龙传》完成以后才能开始落实。不过,肖克、王震同志的建议,却使我萌发了尽责的想法。我认为我是应该写的,为了中青年了解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学形式反映,作为党和部队培养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者,我是责无旁贷的。

1990年3月6日,在军委办公厅审查影片时,我又见到了肖克、王震等同志。肖克同志把我拉到稍后边的沙发上,对我说:“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是很应该写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小说……都是可以表现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当年的红二、六军团的老同志不多了,军团只剩下王震和我,师团两级几乎没有健在的人了,廖汉生、黄新廷、王恩茂、杨秀山几位是硕果仅存的。我以前自认为记忆力不差,如今也不行啰。当年一些战役、战斗的细节还记得一些,再过几年,恐怕就没有人能讲这些历史哆。你编战史改战史,编贺传改贺传,又是作家、电影剧作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能写一写,对革命历史、对烈士、对青年负责嘛!你我熟悉,你到过我家,随时欢迎你来,我会尽所知详细和你谈的。你看如何?”

我确深有触动,向肖克同志说:《贺龙传》完成后,我保证写。写的水平如何,我不敢肯定,只能向您保证竭尽全力。

1993年,《贺龙传》被审查通过出版。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首发式。此后,我即着手看战史,查历史资料,访问几位老红军同志。在1996年写出了《南天一柱》十集电视剧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入拍摄。于是,我终于下决心写长篇小说了。

这个创作始末和创作过程先后经历了二十年,扼要叙述一下,也算是一个记录,一种抒怀吧!

第一章

1934年10月24日。

江西山区。

山峰，

险道，

激流。

刚刚从中央苏区撤出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西方军的名义率领八万六千人，携带着大量笨重的物资和器材，在国民党军队多路追堵拦截围攻夹击的炮火弹雨中，正在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抢渡着信丰河（桃江）。

红军的行列在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小路上前进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的印刷厂、兵工厂的大中小型机器，以及装着档案、文件和资料的大大小小的铁箱、木箱，全都是肩背人抬马驮地走在艰险的山间小路上。这许多物资的随军运送，需要相当多的战士投入，更严重的是行动迟缓，极其拖延了行军速度。以这样的突围行动，对四面围堵的大量敌军而言，是得到了不少方便；而对红军主力而言，当然是遭到了极大困难。

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中央下达命令的时间很迟，突围的目的也很难十分明确，因为主动权已丧失，预定方针能否达到，不是单方面能够完成的。因此，部队的中下层干部和指战员并不了解撤离苏区的原因和撤离后的方针、目的是什么。

一声令下，大军行动，加上迟缓的行军速度，因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的局势。

信丰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子里。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主持中共中央全面领导工作的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全权代表、军事上有决定权的德国人李德以及翻译伍修权都坐在一间茅屋外边的山石上。山石众多，有的石上还长着绿苔，显然不是合适的坐处，不过，他们早已习惯这种生活了。村子四面和房屋周围是警戒严密的红军战士。

黄昏，西方天空的一片火烧云，与山区的十月气候不大谐调。虽然没有风，但坐在冰冷的山石上仍使人们冷得发抖。

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趴在地上，仔细地看摊在大雨布上的地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坐在离其他人稍远的一块大石头上，正似乎显得优哉游哉地大口吸着烟。

博古坐在离李德最近的一块石头上。他扶扶眼镜，朝人们说：“我们终于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啰！全军很快就要渡过信丰河啰！看起来，敌人几十万兵力的围堵追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李德得意地说：“国民党部队军事素质太差，远远比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德国的部队。”

毛泽东在一旁撇嘴一笑，说：“是呀，威廉皇帝为统帅，军事家小毛奇、兴登堡为指挥，不可否认是一支强悍的军队哪！”

李德看看毛泽东，点点头说：“你懂得我们德国历史？听说你没离开过中国嘛。”

毛泽东笑着说：“土豹子一名。百无一用是书生。读过几本书而已。我从书本上晓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

李德眉毛一挑，用手指着毛泽东，厉声问：“毛泽东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依然笑着说：“李德同志，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是共产党员，我讲的是帝国主义的失败，你又何必发火呢？德国军队能打仗是相对的嘛！要看是什么军队，打什么仗。古今中外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嘛。我以为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没想到……唔，冒犯，冒犯！”

李德满心恼怒却又一时无法回答。

毛泽东说：“总司令、总政委、博古同志，诸位高踞名山怪石上的同志，我没讲错吧？我如今是霉星罩命，出言必错，又禀性难移，总想讲几句，真的是：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只为强出头啊！”

朱德笑着说：“没得啥子错呀。德国军队虽然能打仗，却是不义之师。失道寡助嘛！”

周恩来说：“是嘛，这没有什么不对。李德同志，你以为呢？”

博古说：“毛泽东同志，我认为你说的事实不错，但你不应该这样说嘛。修权，把我的话翻译给李德听！”

伍修权翻译着。

李德点点头，怒气似消。

这时，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从茅屋里奔出来，扬着电报，大声地说：“好消息，好消息。任弼时、肖克、王震率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啰！弼时拍来了电报。这可以证明六军团损失不会太大，电台没有丢掉么！”

一下子，坐在山石上的人们都兴奋地站起来。

周恩来立刻说：“迅速以中央名义回电，热烈祝贺他们会师！”

朱德笑着说：“又有一只握紧的拳头啰！”

毛泽东说：“两翼折一翼。六军团这一翼成功了，确是一大胜利。下一步棋怎么走

啊？”

博古看着李德，问：“给他们什么任务？”

李德趴在地下看着地图，说：“让他们分兵，任弼时、肖克、王震率六军团到乾城、凤凰开辟苏区；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在大庸一带活动，扩大苏区，策应我们。他们都由军委直接指挥！”

博古朝叶剑英说：“按李德同志所说起草电报给弼时，以军委三人团或以军委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发电文！”

周恩来说：“我看不大妥当吧？我们是去和他们会师的，他们分兵是不利的呀。”

朱德说：“我和恩来看法相同。”

李德看看刘伯承，问：“总参谋长同志，你呢？是总司令、总政委看法正确，还是我的看法正确？”

刘伯承立刻回答：“我认为不宜分兵。湖南何键的兵力很多，何况，弼时、贺龙他们刚刚会师，又地处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四省边界，贵州敌王家烈、湖北敌徐源泉所部本来就在围堵贺龙的红三军，六军团千里突围刚刚会师，环境生疏，分兵对敌，并不有利。我们决策要三思啊！”

李德“哼”了一声，说：“三思？指挥决策第一是果断，不是那么多思的。六军团出发时的兵力近万，二军团……唔，红三军离开洪湖时兵力近两万人。他们会合后，总兵力当有三万多人，分兵，可以牵制更多追堵我们的敌军，也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嘛！何况，他们分兵也还是有犄角之势嘛！”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们中央和贺龙同志他们早已失掉联系。几年征战，怎么能肯定他们依然保存近两万兵力呢？六军团千里转战，又怎么能肯定他们依然保存一万人马呢？如果估计不准确，让他们分兵就犯了兵家大忌呀！剑英同志，要他们速报兵力、武器、弹药、医药实力和周围敌情。”

叶剑英答：“太必要啰。分兵应该慎重，应该再议。是不是等弼时报来实力再下决断？”

李德不屑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们会师了嘛！我们有号称十万红军呢！”

毛泽东又撇嘴一笑，说：“号称十万，总归不是十万。坐在石头上算人家兵力三万，也未必是三万。他们应当攥成一个拳头打人嘛！”

李德瞪着毛泽东，发火地说：“毛泽东同志，不要忘记自己的位置，你已经不是红军总政治委员了。”

毛泽东一笑，说：“我明白，明白。坐在什么位置么，我岂敢忘记？随便讲几句嘛，听不听在你呀！”

李德朝叶剑英说：“你回电给任弼时，祝贺他们胜利会师！以前命令六军团开辟凤凰地区的任务不变。他们必须分兵，分开，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声势，牵制敌军！”

叶剑英看着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

博古一摆手说：“执行去吧！”

在这里，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总部及红一方面军之所以撤出中央苏区作一个扼要的叙述，以便读者了解一些当时的历史 and 变化。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1927 年 9 月，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 月，起义军千余人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同时，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举行秋收起义。中共琼崖特委在海南岛举行武装起义，开始了创建革命武装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10 月，河南确山县委发动农民起义。此后，广东海陆丰再次举行武装起义。11 月，湖北举行黄安（今称红安）、麻城起义。同月，中共赣西、赣南特委分别先后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2 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动广州起义。

1928 年 1 月，中共领导江西弋阳、横峰武装起义，逐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 月，周逸群、贺龙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在湖南、湖北边境地区发动起义，并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逐渐开辟了湘鄂边及洪湖革命根据地。

此后，福建省中共领导先后在闽南、闽西等县先后举行起义。

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武装会师，组成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

4、5 月间，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领导了渭南、华县农民起义及西北军一个旅武装起义，组成西北工农革命军。

5 月，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发动泰兴、如皋、靖江、南通等地农民起义。

7 月，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了平江起义，与黄公略领导的驻嘉义市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的驻岳阳的师随营学校先后起义到平江会合，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组成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逐渐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大部到达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黄公略率红五军一部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

从 1927 年“八一”起义起，至 1928 年年底，中共领导各地农民或原国民革命军部分武装先后发动了一百余次武装起义，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又经过了一年多的武装斗争，到 1930 年，红军有了很大发展，革命根据地也遍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各省，有的也已形成比较巩固和面积不

小的地区,并组成了工农政权。

1930年6月,组成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四军、第三军、第十二军,共两万余人。同月,组成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辖第五军、第八军、第十六军,共一万余人。7月,组成第二军团(1931~1934年间改称“红三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军、第六军,共一万余人。

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共三万余人。

年底至1931年1月,鄂豫皖地区红军第一军、第十五军会合后合编为第四军,共一万二千余人。

早在7月,赣东北组成第十军,两千余人。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组织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书记。10月,改由毛泽东任代书记,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书记。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领导地位。

此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大小根据地已有19处,以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及红一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四军最为强大,成为当时的三大革命根据地和三大主力红军。而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指挥下也向各个苏区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战斗是激烈的,从未停止过的。由于苏区和红军的日益壮大,11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1月,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奉命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兵力三万人。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12月,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江西“围剿”红军时起义,建立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转战陕南,进入四川。重组的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

同月,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也撤离,在湘鄂边、黔东地区坚持斗争,直到1934年10月与红六军团会师。

12月,陕甘边组成红军第二十六军。

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6月,中革军委指示在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军组成第六军团,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

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兵力九千七百余人,于1934年奉命向湖南中部挺进,10月,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

10月,中央根据地又组建了第七、第九军团。

1934年9月,组成红军第八军团。

1934年,敌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与敌军展开了长达一年之久的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左”倾的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博古等的失策,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中央便仓促决定撤离苏区,于10月率主力及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长征。

这就是红军创建发展的概括历史,也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撤离中央苏区的原因。

开头所述,红一方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边小村子里的活动,就是他们撤离中央苏区,是长征的开始。在这个小村子里,中革军委指示红三军、红六军团会师后的行动,正是本书的中心内容。

二

1934年10月25日。

贵州省东部山区南腰界。

一片欢腾。

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胜利庆祝大会会场。会场是山村外一个很大的平坝子,在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这个平坝子算是很大的了。

由木板搭成的简陋的主席台两边,各有一根长长的杉篙,上边挂着长长的红布横幅,上写着一笔苍劲的隶书:“热烈庆祝会师”。这是红三军惟一仅存的书法家、军部文书樊哲祥的手笔。

主席台上坐着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和其他领导同志。

台下的平坝子上坐满了穿着各色衣服——军装、短衣、学生装……的两支红军的指战员。他们几乎个个身材瘦削,面有菜色,有的抱着步枪,有的背着砍刀,有的握着长矛或者红缨枪,衣冠不仅不整,而且还破旧不堪。但是,人人的脸上充满兴奋的神色和笑容。

歌声不断,笑声不断,让人立刻感到这是一支虽然疲惫却坚强、刚毅、乐观的部队,是一支异乎寻常的钢铁部队,一支久经考验的威武之师。指战员的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使破旧军装、面有菜色被冲淡了许多。

高高瘦瘦的、留了小胡子的任弼时站起来,走到台前,挥了挥手。

台上、台下安静了。

任弼时说：“我宣读党中央的贺电：我们热烈地祝贺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两支勇敢的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并预祝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中共中央。”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任弼时说：“我们两军胜利会师，让同志们先认识一下领导同志吧！”他指了指关向应，介绍着说，“这是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我们在共青团中央共过事。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他的家乡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他是东北辽宁省人，年轻、有文化！”

台下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关向应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朝大家敬了个军礼，挥着手说：“弼时同志是我的老上级！我代表红三军向六军团全体同志问个好！今后，我们共同作战啰！”

掌声中，任弼时一指夏曦，说：“这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同志。他是我的湖南老乡，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号称‘湖南三杰’之一，又是一位文化人呢！”

台下掌声出现异常，六军团的同志热烈鼓掌，红三军的同志则掌声零落，而且大多数同志脸色阴沉，毫无笑容。

任弼时立刻察觉了这种异常现象。他心里并非完全不清楚，重要原因是“肃反”造成的严重恶果。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同苏区及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并给湘鄂西中央分局陆续发来展开“肃反”的指示。作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积极、猛烈而极其残酷地开展了“肃反”运动，从1932年至1934年，几乎杀光了湘鄂西苏区各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及红军的营以上军政领导干部，使根据地丧失，红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使红三军从近两万人锐减到三千人。夏曦还下令解散红三军的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致使“左”倾的中共中央都不得不于1934年5月6日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夏曦的错误，红三军中的“肃反”才完全停止。“肃反”扩大化，夏曦是负主要责任的。健在的红三军指战员是“肃反”劫后余生者，他们也承受过不断进行“肃反”的痛苦，对夏曦不仅仅是不满，甚至可以用仇恨来形容了。只因红军纪律严明，组织原则性强，才对夏曦尽管有着极大怨恨，仍是服从他的领导罢了。

任弼时曾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之一，对这些情况是了解的，甚至是深有感受的。他在担任湘赣省委书记时，就曾经制止了几件湘赣党政军“肃反”准备诬杀的大事，“肃反”的恶果，任弼时是深有所知的。因此，看到台下红三军指战员对夏曦的冷淡，他也是能够理解的。他回头看了看夏曦，作出一个请他讲话的姿势。

夏曦站了起来，脸上毫无表情，朝台下挥挥手，一言不发地又坐下了。

任弼时一指肖克，说：“六军团总指挥肖克同志，我的老乡，湖南嘉禾县人，读过师范学堂，参加过北伐，参加过南昌暴动，那时才十九岁呢！年轻，勇敢，敌人闻之丧胆。他也是一位文化人！”

肖克站起来。他军装整洁，军容出奇的整齐，朝台下的指挥员、战斗员敬了个标准的

军礼，说：“年轻不错。勇敢么，也不错。文化人么，弼时同志过奖啰。南昌暴动，我担任连长，是贺龙总指挥的兵嘛！”

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王震从主席台上站起来，走到任弼时身旁，敬个礼，挥挥手，大声地说：“我自己讲吧！王震，湖南浏阳人，大老粗，矿工出身，打仗还有胆子，心眼儿不多，心眼儿不差，六军团政治委员！”

台上、台阵阵笑声，掌声不断。

王震却扬臂说：“再补充两句，任弼时同志刚才介绍的三位都是文化人，是宝啊！依我看，没有文化人，革命也成功不了。我没有文化，我学！谁也不要以为没有文化，大字不认识两箩筐是个光荣事。错啰！无产阶级也要有文化，懂不懂？”

六军团的指战员齐声呼应：“懂啦！”“早就懂啦！”

红三军的指战员却都怔住了，没有反响。

坐在主席台上的贺龙盯了闭着眼的夏曦一眼，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内心对这次会师更加增添了满意和信心。

任弼时指着贺龙，朝坐满广场的红军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六军团的同志们天天想看到的贺龙，就是他！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暴动的总指挥，我们的红三军军长贺龙同志！”

顿时，台上、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贺龙头戴八角帽，上边缀着由红布剪成的五角星；腰扎皮带；下身穿了一条洗得变了色的长裤；脚上穿了一双崭新的草鞋。他那方正的脸上长着一双闪闪发光、流露着坦诚目光的眼睛，两眼长得稍显细长，嘴唇上方留着短而黑的胡子；手握着一根长烟袋杆子。他走到台前，向指战员们亲切地看了一阵，向大家敬个礼，笑着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啰。两把菜刀闹革命，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另一把菜刀是拿在我的一个把兄弟的侄孙手里呢！两把菜刀闹革命，说明什么呢？好处是坚决、大胆、敢拼命，毛病是不懂得发动群众闹革命，算不了多大的事嘛！认不得真的哟！”

会场上爆发出阵阵笑声。贺龙的风趣和亲切，使会场上的气氛欢快起来。

贺龙还是笑着说：“南昌暴动总指挥么，真正应该称作代总指挥，原来想的总指挥不来，只好让我来代了。真正的领导，真正的总指挥是周恩来同志，是中央派来的前委。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党员，只是有一颗忠心，听党的话嘛，还有一股子劲头儿，打倒蒋介石反动派嘛，为工农打天下嘛！失败了，再干起来嘛，只要决心干，早晚会胜利，会成功的嘛。对不对？小孩子不摔几跤就学不会走路。咱们共产党、红军是白手起家拼起来的，哪有一个跤子也不摔的？有一种玩意儿叫‘不倒翁’，是永远不会摔跤的，却也永远只能是一个玩意儿么，对不对？”

“对！”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贺龙晃着手里的长烟袋杆子，笑着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来

自湘赣,那是朱德、毛泽东创建的苏区。朱德总司令是我的老师,大革命的时候就很熟啰,南昌暴动,我们联手的。毛泽东总政委没见过面,听说他是个有文化的人,秋收起义以前,没带过兵,没打过仗,真是了不起的大才。朱毛红军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热烈欢迎你们!同志们,我贺龙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欢迎我们这些老师!”

全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贺龙挥动双手,笑着说:“欢迎老师,按规矩该摆酒,如今,我贺龙穷啊,摆不起酒席啰。不过嘛,大家吃顿饱饭,打打牙祭,还办得到。算我欠了同志们一顿酒席。过一阵子,打个胜仗,让蒋介石还有咱们湖南省主席何键掏腰包请客么。何键么,我熟,信佛,老虎戴念珠假充善人,连酒肉和尚还不如,让他请客,让他心疼拿酒拿肉出来,最好掏空他的腰包!”

会场上又是一阵欢快的笑声。

贺龙说:“我晓得大家的心情,你们好不容易走五千多里路来到这里总是想休息一下,睡个好觉,打上几双草鞋,安逸上几天嘛。我看,这个想法又合情理,又不过分,算是最起码的、最小的心愿吧!可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休息的。本来,我这里的苏区刚刚建立起来,还不很巩固,不很平静。我们这一会师,树大招风啰。我料想,蒋介石不会让我们睡个好觉,他自己也睡不着觉了呢。我们的根据地在哪里呢?”他用烟袋杆子敲了敲自己脚上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创造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一天,我保证让同志们穿新衣、戴新帽、背新枪、吃饱肚子、睡几天好觉。唉,可惜,我们的蒋委员长就更睡不着啰!”

会场上又是一阵欢笑和鼓掌。

三

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红三军初创的狭小根据地黔东苏区暂短地停留下来了。

黔东苏区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的部分地区,纵横近二百里,人口十万以上。红三军来后,建立了特区党的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发展了部分新党员,建立了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六十七个乡苏维埃,初步分配了土地。红三军补充了近两千名新战士。但,由于敌军进攻,苏区缩小了三分之二,只剩下南北长六七十里,东西宽三十里,十二个区,人口三万的狭小地区。这就是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的立足点,极其艰难的立足点:三万人口的贫困山区,供应七八千人的红军每天必不可少的粮食,困难势比登天。仅此一个因素,红军也无法久留了。

两军会师的时间是1934年10月24日,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是25日,28日就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向湘西发动攻势,他们在黔东苏区实际上只住了四天。但是,这四天却

是两军团结、稳定、进步的关键。使两军各自有了很大变化,有了在革命战争中结成的深厚友谊,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甚至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武装力量,为建立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会师之时,红三军只有四千四百多人,红六军只有三千三百多人,合起来不足八千人,却有伤病员五百多人,是困难重重的疲惫之师。

红三军和六军团虽然都是工农红军,但由于各种因素使得各有特色和不同,各有长处和目前存在着的弱点。

红三军自从1931年中共中央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派来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后,除了与兵力几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奋战之外,更主要的是夏曦超额贯彻了中央“左”倾指示,特别是在红军和根据地各级领导机关全面而多次推行了“肃反”,诬杀了大批党政军各级干部,使红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直到1934年,夏曦悍然决定取消军队和政府机关的党团组织,使得红三军从两万多兵力锐减到不足三千。没有了政治机关,也就没有了政治工作;撤消了参谋机关,也就失去了作战的指挥力量。整个红三军最后只剩下四个党员。即:书记夏曦,委员关向应,贺龙还算是共产党员,另一位是师长卢冬生。他虽然没有被取消党籍,但已不参与中央分局的活动,只是“肃反”中劫后余生的极少数干部中的一名,所以,被笑称为“半个党员”。所以,红三军实际上只有三个半共产党员了。1934年,开辟了黔东苏区后,“肃反”已经停止,党团组织开始恢复,政治工作机构也在重建,部队人数也稍有增加,基本结束了近两年“流窜”式的活动,稍稍恢复了一些革命的精神和活力。

另一方面,从1932年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至1934年10月,尽管被取消了党团,被诬杀了大批好同志,但,这支队伍毕竟是一支久经磨练的红军,健在的指战员革命意志仍在,与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坚决,仍然是有生机的革命武装。湘鄂边地区是1927年贺龙、周逸群领导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曾经兴旺一时,工农群众奋起,具备很好的革命条件和复苏条件。

所以,六军团来到与他们开辟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从地形到民情、风俗不同的黔东地区,可以说是十分生疏,一旦与强敌斗争,取胜艰难,生存和发展也是未知数。所以,对与当地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的红三军有着依存心情,加上贺龙曾是南昌暴动的总指挥,威望很高,六军团的领导和指战员都很为敬重。

而红三军对六军团不畏艰险转战江西、湖南的英勇坚定是钦佩的,对六军团带来的井冈山传统、红一方面军的许多宝贵传统和经验,也是十分重视和欣慰的。

会师后,六军团政委王震立刻向贺龙等汇报了部队情况,请求指示。

贺龙笑着说:“哪有那么多的指示。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沿途转战,和敌人日夜不停地拼命,损失不小,人困马乏,武器弹药医药粮食长期缺乏。人嘛,就是全身都是铁能打多少钉?全凭一股革命精神才能保持打不散、打不垮呢。我没念过几天书,可从小就喜欢听书。你看太平天国派出一支兵力很强的北伐军,指挥官是名将林凤翔、李开芳,几千